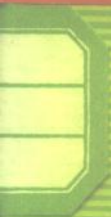


經濟譯叢

第四輯



A19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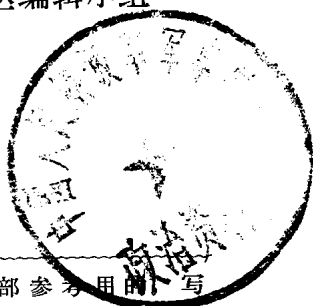


2 019 0037 2

经济译丛

第四辑

经济译丛编辑小组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6年·北京

内部发行

经济译丛

第四辑

经济译丛编辑小组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5 1/4印张 106千字

1976年10月第1版 197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017·158 定价: 0.42元

编 者 的 话

从 1973 年年底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周期性的严重经济危机。为了研究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特点和深刻影响,为了了解和批判美帝、苏修特别是苏修对这次危机的观点,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本辑选译了美国和苏修的一些有关论文(主要是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的部分发言和总结发言),供有关研究工作者参考。

对苏修作者在论文中所宣扬的许多修正主义观点,如强调所谓“结构性危机”,胡说石油涨价是引起危机的原因,特别是乘机散布“缓和”幻想,妄图掩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罪恶活动等等,必须坚决予以揭露和批判。

目 录

苏联社会的性质(续).....	3
〔美〕 保罗·斯威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9
〔美〕 维克托·佩洛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在苏联世界经济与国际 关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上的讨论)	31
日本经济的严重困难	31
〔苏〕恩·库佐宾娜	
美国经济与国家调节体制的变动.....	35
〔苏〕 阿·阿尼金	
美国: 资本相对的过剩	38
〔苏〕 格·纳伊坚诺夫	
就业问题尖锐化的原因	40
〔苏〕 恩·加乌兹涅尔	
在危机面前垄断资本的战略	44
〔苏〕 尤·科切夫林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加剧的新因素.....	49
〔苏〕 阿·格里科尔耶夫	
跨国公司与资本主义经济	52
〔苏〕 勃·科姆津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59
〔苏〕B.雷马洛夫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讨论会总结发言.....	96
〔苏〕B.马尔蒂诺夫	
经济危机的历史剖析.....	119
〔美〕《每月评论》	
停滞膨胀.....	142
〔美〕雅各布·莫里斯	
凯恩斯主义自食其果.....	152
〔美〕《每月评论》编者	

苏联社会的性质(续)*

〔美〕保罗·斯威齐

我曾经在《每月评论》11月号的本专栏中,对夏尔·贝特兰关于苏联的新著第一卷**的《前言》,写了摘要并作简短评论。我要在本文中,指出这本书其余部分所涉及的某些主要论题,并且在最后还要提出一些理论上和方法上的问题。

推翻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

每一次真正的革命都具有两个方面:推翻旧的权力结构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前者为后者开路,但并不保证后面这个明确任务会被圆满地完成。这就要看通过革命取得权力的新分子的力量和认识——当然还取决于需要克服的阻力的大小,以及被击败的、但还活着的旧社会拥护者的反抗程度。我认为把贝特兰的主要论点概括如下是适当的:在俄国的情况下,革命力量过于薄弱,而且由于没有历史经验为依据,就(不可避免地)十分缺乏必要的认识,来解决以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旧秩序过程中所引起的极其复杂和困难的问题。

造成俄国革命力量薄弱有多方面原因。它的社会基础自

* 《苏联社会的性质》前半部分已经在《经济译丛》第一辑刊载。

** 《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一阶段(1917—1923)》,巴黎1974年版。

然是城市产业工人阶级，而它的领导力量则由布尔什维克党来提供。问题不在于有这样基础和被这样领导的革命力量缺乏革命精神和经验。如果是这样的话，1917年十月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问题在于：在全部人口中，无产阶级所占的比重很小，在大多数俄国人所居住的农村中，布尔什维克党人只保持很少的联系，而且几乎毫无影响。在这个基本情况上，还要加上内战时期（1917—1921年）的可怕损失和脱节。这一点对于理解在苏联所发生的情况是如此重要，它又是如此被普遍忽视或低估，因此似乎有必要在这里引用一大段原文：

二十年代初期，俄国无产阶级遭到了可怕的伤亡。它简直在内战年代中消失了，在新经济政策开始以后，它还继续消失下去。所以，1922年在职工人人数还不及战前的一半，在同一疆域内，大约460万人，而1913年为1,100万人。1922年在职的这460万人中，只有200万人从事工业生产，还有120万人构成农业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而且这个人数大为减少的在职的工人阶级的构成也起了深刻变化。无数老工人，包括那些最富于斗争性的人，都在前线牺牲了。另外一部分人则被党、工会、国家机关所吸收。再有一部分，特别是处于大工业中心的老工人，则因失业或缺粮而脱离工人阶级队伍、回到家乡去。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出身的、通常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男女则混入工人阶级队伍，以取得体力劳动工人的配给品，或者借此隐瞒他们的阶级成分。

在1亿3千600万总人口中，大约半数为宜于劳动年

龄的人，而在这里面，构成新掌权阶级的起核心作用的有生力量是很弱的。即使在 1922 年的在职人数上，再加上愿意回到生产岗位去的老工人，情况也是如此。基本上不能依靠工人阶级的特殊力量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首先依靠工人阶级的组织以及这个组织对人民群众实行思想和政治领导的能力。（第 151 — 152 页）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力量最强、最有经验的地方，也无法用新的革命机构来代替旧的沙皇行政机构和官僚。而在它力量最为薄弱的农村，它几乎无法左右那里事态的发展。其结果是：它不得不尽量利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乱七八糟的、不讲效率的、腐败的国家机器，来勉强应付工作。此外，理解下面的情况是很重要的：这个承继下来的国家机器不仅有上述的缺点，而且有其无法消除的阶级特性。在本质上，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经过世代才建立起来的，浸透了资产阶级意识，有着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工作作风，而且对它被迫去为之服务的革命政权的思想意识及其目标十分仇视。贝特兰以 1922 年夏季所作的一次调查为例（第 469—470 页），来证明上述的后一种情况并反映这个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这次调查说明：只有 9% 的留用人员和 13% 的新录用人员是赞成苏维埃政权的。

由于国家接管了原来属于私人资本所执行的职能，布尔什维克党人不得不增添并且扩大政府机构。这个政府机构就必然是，而且一直成为保存及恢复资产阶级关系的温床，这种作用不仅限于政府部门，而且还遍及整个苏联社会。而有讽

刺意味的是：领导上为了控制和防止这种发展趋势，采取了不少措施，其效果适得其反。特别是被派往国家机构去执行国家政策的正直革命者往往被新的环境所同化，也变成通常的资产阶级官僚。这并不是他们有意背弃对他们的信托。恰恰相反，我们有把握设想，他们大概是竭力来尽他们的责任的。然而即使这样做，他们也还要受周围人的思想作风的影响。比起别种人来，工人可能对这种影响作较长时间的抵制。不过要是认为阶级成分就能永远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话，那就错了。列宁对这一类问题极为敏感，远远超过布尔什维克党大多数其余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程度。他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据贝特兰说：

他把布尔什维克党所处的地位和一个征服别人的民族的处境相比拟。前者虽然占有国家的领导地位，但还没有能够真正领导它。后者虽然表面上征服了另一个民族，可是到了最后，尽管他们还继续占领着别人的领土，他们实际上却已被自己征服的民族所征服了，因为被征服者有更高的文化，“会强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

除了派可靠的革命家担任重要的国家职务之外（在红军中，就建立了政治委员制），还采取了措施来对付国家机构的敌对的、资产阶级的性质。1919年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

* 第262页，引自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月）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一年以后，布哈林就采用这一个比喻，写了一篇极其有趣的文章。贝特兰在自己书中第262—265页，从这篇文章里引用了很长的一段话。

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一年后改为工农检查院，仍由斯大林领导。但是这个机构也逃脱不了其他政府机关那样的命运，也只不过变成彼此对抗的官僚机构的一个分支而已。贝特兰引证列宁在逝世前不久（在他那篇的确出色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写的一句话说：工农检查院“现在没有丝毫威信”（第257页）。的确从列宁在逝世前一年左右所写的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机器的这种状况（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那篇文章的另一部分，他把这种情况称为“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使他日益忧虑，几乎梦寐难忘。^{*} 现在猜想，要是他能够活下去，并且重新对党和国家实行有力领导的话，他会怎样努力去补救这种情况，那是饶有趣味的。固然这个设想不可能一定有把握，但是估计他迟早会发动类似六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群众运动，来清洗和监督政府机构，这决不是一种幻想。E. H. 卡尔写道：“就算列宁由于实际需要而不得不承认权力的不断集中的话，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他对‘直接民主’这一解毒剂失去过信心。”^{***}在二十年代初期那种混乱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实行这种办法，但过几年后，在比较平静的环境中，是可以认真加以考虑的。

经济上资产阶级关系继续存在

十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关系和意识不仅仅继续普遍存

^{*} 莫希·卢因所著的《列宁最后的斗争》（1968年，纽约版）一书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贝特兰提到这本著作。他原可大量采用这本书中的资料，但他却用得不多。

^{**} E. H. 卡尔：《1917—1923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一卷，第224页。

在于国家机关。在农业中,这种情况是十分明显的:在这个领域里,十月革命(和以后的新经济政策)建立并巩固了一个小农私有制,它又引起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和富农阶级的蓬勃发展。在工业、交通运输业和财政部门,即收归国有的那些经济部门里,继续保留着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点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上述两点。

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坚持下述的观点: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财产所有制的形式,而在于处于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集团和个人之间的实际关系。公有制为改造这种关系开路,并且是这种改造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但它本身并不构成或者保证完成这一改造。只有通过长期和艰苦的斗争才能完成这一改造。在苏联,这个斗争不但没有彻底进行过,甚至根本没有开始过。贝特兰在他关于中国工业组织的新著中,极其精辟地说到这一点:

一长制、专家治厂以及强调劳动分红和物质刺激的原则并不是单单存在于今天苏联的管理方法中,早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困难情况下,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已在俄国实行了。这些原则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被保留下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迅速发展工业的时期中,更被广泛推行。*

上述原则当然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核心的那种劳

* 夏尔·贝特兰:《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工业组织:管理及劳动分工的变化》,每月评论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73 页。

动分工等级制度的。列宁十分明白：布尔什维克党、政府执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走向社会主义。事实上，他是从恰恰相反的角度来解释扩大专家权力以及提高其待遇的决定的：

这种办法显然不只是在相当部门内，在相当程度内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并不是一批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向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

贝特兰接下去说：问题在于，这往后退一步之后，再也没有接着往前进一步。他以下面一段话来结束他对苏联在这方面演变的简短讨论——它实际上归纳了我所评论的书中的远为详尽的分析：

列宁的看法可能适应俄国革命特定阶段的需要。但是这些原则一经采用（自 1918 至 1922 年）和执行后，再也没有被废止过。工厂厂长和厂党委书记的权力——不受工人监督的权力——反而与年俱增了。在工厂中，一头是发号施令的行政领导、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另一头是接受指挥的直接生产者，这种关系的巩固实际上就为苏联修正主义的滋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 贝特兰在《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工业组织：管理及劳动分工的变化》第 74 页中引证了这一段话。中译文见《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02 页。

** 贝特兰：《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工业组织：管理及劳动分工的变化》，第 76 页。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这种关系的巩固不但使苏联修正主义的滋长有了肥沃的土壤，而且和政府机关中保留下来的资产阶级关系加在一起，就构成苏联修正主义的实质。列宁，当然还有俄国革命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不少其他领导人，了解这一情况，但却没有力量采取有效的反措施。以后当情况变得有利于进行改造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斗争时，甚至连党的领导本身也已经失去开展这种斗争所必需的认识和意志了。这种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并在内战和重建的困难年代中，不得不加以保留和巩固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修正主义不仅成为家常便饭，而且也成为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一点大概将是贝特兰要发表的本书第二和第三卷的中心论题之一。

某些理论和方法上的问题

阶级和阶级斗争 我感到贝特兰研究所依据的阶级理论并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它是由下面一段列宁的话完善地加以概括的：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第 119 页）

但是这条定义，如同一切简要的定义和特性描述一样，也

有其弱点。它固然使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特定社会在某一时刻的阶级结构全貌，但当我们要对一个阶级体系的动态加以分析时，它就没什么用处了，这就是：研究决定个人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决定他一生之中在那个地位上的变动的因素；研究各阶级怎样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采取行动以促进自己的利益；研究各阶级是怎样组织起来并且相互作用等等——诸如此类的几乎无穷尽的课题。我决不相信会有一个阶级的理论能满足研究所有这些困难问题的需要，但是我的确也认为：对列宁—贝特兰的理论作了一些补充，就能有助于弄清楚象 1917 年以后的俄国和 1949 年以后的中国那样的过渡性质社会所提出的某些最重要的问题。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计算阶级成员时，应该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人作为单位。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生来就有一定的阶级地位，这一事实就基本上决定了他或她的前途。但这并不就是说：个人出生于哪一个阶级，就一直处于那个阶级之中。他们可以通过每一个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历史上特定的方法及渠道，在阶级结构内上下移动。流动的个人把他们的家庭带到新的阶级地位上去，或者在新的阶级地位上成立新家庭。但一般至少需要两代的时间才能使地位下降的家庭接受其新的地位，或使地位上升的家庭被接纳到新的阶级地位上去。

在“正常”时代，资产阶级的阶级结构是靠一个国家机器所执行的财产法来支撑和巩固的。这个国家机器是专为保障这个制度，并为其受益人（即构成统治阶级的财产所有人，或者包括有重大差别的多种所有制中构成那些统治阶级的各种财产所有人）谋利益而设计和训练出来的。革命的明确特性是

推翻国家，并且改变财产制度。根据以前所说的，我们知道，决定社会阶级结构的真正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是由于革命铲除了这些生产关系的保护者和巩固者，并且使一个在利益上同原来统治阶级针锋相对的阶级的代表当权，它就可改变实际生产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它也在阶级体系中引入了在前一阶段从来没有过的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朝着相对两个方向的变动都大大增加了。许多财产所有人不仅失去财产和权位，而且往往被迫流亡或是在肉体上被消灭。倒过来，许多工人则被提拔到劳动分工等级中掌权的位置上去。这些变动规模之大使人感到好象旧阶级体系已经实际消灭了，甚至连阶级也开始一起消亡了。但是如果透过表面，观察一下实际生产关系，就会看出这种表面现象是虚假的；根本变革只能慢慢地产生，而且还要通过长期和复杂的斗争。即使这样，也许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变革。

贝特兰，也跟着中国人，把这叫做阶级斗争。我认为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同时我认为，理解到它是具备某些特征的阶级斗争也是很重要的。这些特征使这个斗争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那种阶级斗争。

的确从某种意义看来，通常类型的阶级斗争在革命后还继续进行着。被推翻的统治阶级总是企图通过组织反革命叛乱，以便卷土重来。他们通常总是在没有发生过革命的外国同阶级人的帮助下这样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旧统治阶级成员的逐渐死亡，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逐渐减低，最后变成无足轻重了。当贝特兰写到关于苏联或中国的阶级斗争时，当然不会考虑到这一点。因为这两个国家都

沒有受到可能还存在的任何旧统治阶级残渣余孽的严重威胁。他真正考虑到的是一种远为复杂的现象。那就是：那些在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机构和经济部门（包括专业、教育和文化机构）中处于权势地位的人力图牢牢抓住自己的地位，并且寻求新的方法以巩固、保护和继续保持他们在社会中的有利地位。

在这里，家庭而不是个人作为阶级成员的基本单位这一事实有特殊的重要性。假如每一个人生来就有均等的机会以达到社会结构中一定地位的话，我们所知道的那种阶级根本就不存在。但是——这是关键的一点——只要在收入、地位和权势上的差别继续存在，这种机会均等的情况就是不可想象的。出生于地位比较优越的家庭里的子女总是占便宜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封建社会是这样，在自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也不例外。因此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中，阶级斗争集中表现在因社会分工而处于不同地位的家庭之间的实际不平等上，这一点决不是偶然的。这些不平等不仅，或甚至也不主要表现在收入这一点上。对于实际上有同样发迹机会的子女说来，相当巨大的收入差距也没有什么不利的地方。不少较难确定的、较为隐蔽的、和无法衡量的其他因素比这点更为重要：诸如出身于较“有文化”的家庭环境的有利条件、接受教育的不同机会、同有权势的人有“社会关系”，子女从父母那里得来的本身有力量的感觉和自信力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无形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都起作用。在那里，它们和收入的巨大差距以及财产所有权相互作用。而在后面两个因素已经消失或者大为缩小的情况下，无形因素就更见其重要了。